神采各异的历史人物画卷

——《战国策》人物塑造上的艺术成就

王佩娟

摘 要 以描写人物为主旨的《战国策》，塑造了一系列战国人物。它引入和变革了艺术虚构手法，发展了中国史籍工于记言的传统，为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开了先河。

关键词 《战国策》 人物塑造 艺术虚构

战国时期，华夏民族开始走出神祇的阴影，人们发出了“君子敬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”[①]的呼声，文化艺术领域则出现了旨在记载人的咤叱风云面貌的历史巨制《战国策》（以下简称《战》）。

虽然与司马迁笔下成熟的人物传记相比，纂集于秦末汉初的《战》还显得稚嫩，其大部分篇章还只是提供了历史人物的某些活动片断，还称不上是独立的人物传记，但与成书于战国初年的《左传》相比，它在文学表现对象、文体结构形式上，都独具特色。《左传》旨在描述历史事件，它以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为全书线索，历史人物则服务于记叙历史事件，而《战》则以描写人物为主旨，以人为中心来组织材料、描述事件。《战》的出现，为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开了先河，它在人物塑造上的艺术成就，是不容忽视的。

一

《战》中出现的士的形象不下五百，大多似流星，只留下耀眼的一瞬，但也有二三十人，他们的身影，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中，其中的陈轸、公孙衍与范雎形象，更为耀目。由于书中用材繁富，这些形象写得比《史记》本传更生动、多采。

《战》中论足智多谋，当首推陈轸、公孙衍。同是写智谋之士，书中又能突出其各自特色，而不雷同。写陈轸突出其沉稳老练，写公孙衍，则侧重其狡黠多诈。

书中的陈轸形象，与一般朝秦暮楚的策士不同，他在政治上有定见，一生致力于合纵，不仅多次为楚排忧解患，且曾促进齐楚联合，以求遏秦。在楚国逗留30年，眼看自己的忠告屡遭否定，自觉难以靠楚怀王来推

行合纵时，才离楚游说赵、齐，促进齐与三晋的联合。他的“天下为秦相割，秦曾不出力；天下为秦相烹，秦曾不出薪”的评论，对秦离析六国，使之争斗，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的伎俩，作了中肯的剖析，足以发六国之士深省。与陈轸一生坚持定见不同，受命于魏国势转微之际的公孙衍，表现了很大的投机性。作为魏相，他一改魏国联齐楚以抗秦的国策，对列强平送秋波，一则为求摆脱魏的孤立，一则为坐山观虎斗，谋求从中取利。书中写他为解魏危，使出全身解数来行诈。如当他得知齐欲与燕、赵、楚会晤，共谋排魏时，便抢先买通关节，约会齐王，故作长谈，以制造魏、齐亲善的假相，使三国生疑，排魏会晤流产。他的种种外交手腕，使他博得策士的赞叹，称他是能“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”的“大丈夫”[3]。

陈轸、公孙衍又同受张仪的排挤，书中在写他们与张的斗法时，也各有特色。面对张仪谣言攻势的围追堵截，陈轸能沉着地通过说理来转守为攻。最初他事奉秦时，张仪诬陷他“常以国情输楚”，心存怀疑的秦惠王也以“子欲何之？”进行试探。他坦然自陈，“愿至楚”，并称自己敢于至楚，正证明自己对谋主秦王忠诚。因为“臣不忠于主，楚何以轸为［臣乎］？”再说，“忠且见弃，轸不至楚，而何之乎？”这接连两个理直气壮的反诘，使秦王也不得不点头称是，张仪的诬陷不攻自破。与陈轸的反击方式不同，公孙衍则采取了以诈制诈。当张仪进谗言，让魏王解除了伐齐失败的公孙衍的相职，以张仪代之时，公孙衍不动声色，然而在张仪以秦魏使臣身分，欲经卫入齐，搞齐秦联合时，公孙衍突然通过卫君，表示愿与张仪修好。在宴会上，他“跪行”为张敬酒祝福，又不辞辛劳，亲自送张至齐边境。他的这番招摇过市、卑恭热情的表演，果然激怒了齐王，使齐王怀疑张仪必定与齐国的仇人公孙衍密谋卖齐，从而使张仪联齐秦的打算破产。

范雎是《战》中着力刻划的又一策士形象。《秦策三》总共18章，他的活动占了11章，其中不少章被《史记》本传大段引用。书中把他的老辣圆滑，表现得淋漓尽至。在范雎入秦时，秦昭王已南拔楚都，东破强齐，数困三晋，根本不把六国之士放在眼里。因此，为了博得秦王一见，他在上书时颇用心计。他以有话不便在信中深说，暗示自己进言的极端机密与重要，从而激起秦王的好奇与兴趣，于是很快受到秦王超乎寻常的礼遇。先是“庭见”、“敬执宾主之礼”，反常的尊敬使“见者无不动容变色”。然后“屏左右，宫中虚无人”，长跪求教。对昭王的礼待，老辣的范雎不为之心动，只恭敬地虚应“唯唯”，而不正面作答。经昭王再三盘问，方申明自己不敢作答，一是由于与王关系尚远，而所欲陈说的，则是“匡君之过”与涉及君主至亲之事，故不便开口；二是怕自己尽忠进言却遭祸，不能有补于秦，反使天下之士从此“杜口裹足”不敢入秦。直到秦王明确表态：“事无大小，上及太后，下至大臣，愿先生悉以教寡人”后，他才打开话匣。即便如此，他也谨慎地只提外事，不言及内事。他只字不提穰侯执政期间所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就，而是抓住了穰侯的联近攻远方针大作文章，攻击穰侯推迟了秦国建立王霸之业的时间表。他对穰侯的否定，与他提出的“远交近攻”的对外政策都深中秦昭王下怀，因此他的进言顺利地被采纳。四年后，当他的谋略取得成效，自己作为秦的功臣、昭王的亲信，也站稳了脚跟后，才提出了清除宣太后与以穰侯为首的“四贵”的内事计划，促使昭王下决心废母、逐舅、驱弟，巩固君主专权。《战》比《史记》更深刻地展示了范雎的内心世界，表现了经历过屈辱与死亡威胁的范雎，内心那种超乎寻常的冷酷与狠毒。他心狠手辣对迫害过自己的人，睚眦必报，斩尽杀绝不手

软。他狂妄自负，既看不起权贵，认为平原君之流不过是有名无实的无能之辈；也蔑视士人，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为追逐财利而互相咬斗的狗。他权势欲极强，忌贤嫉能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，但又深知进退，能冷静地听取他人劝告，及时称病告退以保身。《战》刻划和揭示出有如此复杂内心世界的形象，其表现力无疑是很强的。

《战》中的张仪，几乎是诈与谮的化身。其实，历史上的张仪，并非只会行诈、好谮。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有他向苏秦报恩的故事④，《吕氏春秋·报更篇》也有他任秦相后向善待过自己的东周国君报恩的记载。《战》中对张仪的这种近似漫画式的写法，显然受秦末汉初人们反秦思想的影响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作为助秦统一中国的大功臣，当然会被视作大恶人。

《战》中的苏秦形象，从总体来看显得模糊不清。这是由于“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”⑤，以至使苏秦几乎成为策士活动的总称。其中最出色的篇章莫过于《秦策一·苏秦始以连横说秦章》与《燕策一·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》。虽然前一章与史实有出入⑥，但文中痛快淋漓地揭示了战国时期的世态人情、策士的酸甜苦辣，后一章则传神地展示了战国策士横挑传统的风采。

二

《战》中所状写的众多统治者形象，也各具特色，其中刻划得最精采的，当数赵武灵、秦昭、楚怀。

战国时期，各方面都面临着剧烈的变革。对于这众多的变革，《战》中展示得最充分的，是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。建立适应山地作战的独立的骑兵部队，以代替传统的单一的车战，以上衣下胯的胡服，代替博衣大带的华夏服饰，这本来只是一场服装制式与作战方式的变革，旨在强兵以拓疆，然而由于触犯了传统，而遇到很大的阻力。以叔父公子成为首的保守势力，认为这是“以夷变夏”，是变开化为野蛮，违背了祖宗的遗愿、华夏的礼俗，必定会招致灾祸。赵武灵王对反对派作了艰苦细致的说服争取工作。他倾听他们的呼声，同时又指出：富国强兵，开拓疆土，洗雪异族入侵的国耻，这才是祖宗的遗愿，不能因怕担恶名而拒绝变革。他还提出：“古今不同俗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袭，何礼之循？”因此，习俗、礼法只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这才是圣人治国的原则，而那些“以古制今者，不达于事之变”。在说服教育的同时，他又明确表示，对执意不从的顽固派，将绳之以法。《战》中的《赵武灵王平昼闲居》等篇章，是当时的改革派向保守势力发出的挑战书，赵武灵王的思想，显然为战国后期法家人物韩非思想之滥觞。

书中的秦昭王具有复杂个性。他似乎怯懦无能，执政的前三十多年，事事听命于母后宣太后，甚至连处理母后杀姘夫、又灭其国这类不光彩的事，也要孝顺恭谨到“日自请太后”。他似乎轻率无知，委军政大权于舅舅穰侯，而不作提防，听凭穰侯擅派使臣、擅扩封地、改变由他制定的战略方针。然而，软弱表相背后，隐藏的是鹰隼般的凶狠与韬略。他退忍，只是由于自己羽翼未丰，秦国还欠强盛，他还需要母后的政治经验、舅舅的英勇善战。当秦国势转强，他又获得多谋善断的范雎作为羽翼后，便一改懦弱表相，先从外事入手，以远交近攻取代穰侯的联近攻远，短短几年，就从韩、魏夺得大量领土，扩大了秦的版图，使自己威望大振，而原来颐指气使的宣太后与“四贵”顿时暗然无光。四年后，他便毅然废母、逐舅、驱弟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以夺回一度旁落的君主大权。以后，他封范雎为应侯，尊之为父辈，似乎又退回懦弱无能的境地，事事听命于范雎。其

实不然。在范雎为他完成了拨乱、除患、解难、拓地、强国等一系列使命后，他便对这条逐渐丧失效用的走狗防范、生疑[7]，逼得范雎乖乖地辞职交权，好让他以新亲信取而代之。由此可见，《战》中的秦昭王从主导方面看，是个能隐忍、精韬晦的君主。书中也揭示了他心浮气躁、平庸浅见的一面（见《秦策四·秦昭王谓左右章》），从而多侧面地揭示这一人物的复杂性。

写昏君不满足于表现其奢靡淫佚、远贤近佞等表面缺陷，而是从较深层次揭示造成其失败的悲剧性格。这是《战》在人物刻划上比《左传》更高明的地方。楚怀王形象的刻划便是如此。《战》中注重写他既贪利又短见、既自大又无能的悲剧性格。楚怀王轻信张仪献商於之地六百里的谎言，最后吃大亏的故事，在《战》中记载得出色。《秦策二·齐助楚攻秦章》，绘声绘色地状写了整个事件中他的各种情态。先是让张仪的阿谀哄得他飘飘然，解除了对秦野心的戒备，把联齐抗秦的国策置于脑后。献地之事还只是张仪的空口白话，他便急不可耐地公诸朝廷，并得意忘形地接受朝臣的庆贺，而喝令对他提出忠告的陈轸闭嘴，让陈轸静待他的成功。书中极写其急于求成的浮躁：派出去与齐绝交的第一拨使臣尚未回国返命，他又匆匆派出第二拨。书中极写其低能：张仪称病不接待楚国前去受地的将领，楚怀王非但不疑其中有诈，还认为是张仪对他绝齐决心的考验，立即派勇士赴齐辱骂齐王。当骗局被揭穿时，他的低能又使他以感情代替理智，再次拒绝陈轸联秦伐齐以全楚的良策，不顾全局，一心只想伐秦以报仇泄愤。最后，把原来由齐助楚伐秦，并取得大胜的一幕历史喜剧，改写成了秦、齐、韩三国联合伐楚，楚军大败的悲剧。楚怀王仗着父辈留下的强大国力，如能实行正确的外交原则，争取盟友，本来完全有实力与强秦周旋于中原，然而他的贪利自大又短见无能，使他一再拒绝陈轸的忠告，一再上当受骗，最后沦为孤家寡人，成为众矢之的，不仅在群雄角逐中成为输家，还搭上了自家性命。《战》展示的史实，有力地说明，这是他悲剧性格导致的必然。

三

《战》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，取决于它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。这种创新，特别体现在艺术虚构手法的引入与变用，以及记言艺术的提高上。

所谓艺术虚构手法的引入，是指对史实的虚构。《战》全书460章，有近90章被史学家确定为策士的拟托之作。如开篇第一章《秦兴师临周章》，便被认为“事多虚诞，不可信用”[8]、“疑必无是事，好事者饰之耳”[9]。这些拟托之作中，不乏文学名篇，如苏秦发迹前后不同遭遇的故事（《秦策一·苏秦始以连横说秦章》）、甘罗十二拜相的故事（《秦策五·文信侯欲攻赵章》），都已家喻户晓，而《唐且不辱使命》（《魏策四》）、《邹忌讽齐王讷谏》（《齐策一》）则先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。这些故事若衡之以史实，则严重失真，但它借助艺术虚构，创造了有艺术魅力的文学形象，描绘出一幅幅逼真的世态。如《苏秦始以连横说秦章》中，对其家属前倨后恭情态的描绘，特别是写其嫂，在他失意时，不屑为远道归来的落魄亲人为炊，而在他得势时，则蛇似地匍匐而行，又跪又拜又谢罪。疏略几笔，就将当时市井中人认钱、认势、不认亲的世态，表现得入木三分。这类作品被史家称为“辩士的寓言”[10]，是文学创作而非史传，但由于它极具艺术魅力，能突出夸张地再现社会本质真实，以致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时，也常不忍割爱。

所谓艺术虚构的变用，则是指对史实不作整体的虚构，只是在细节描写上，作合理

想象。《左传》在记言上运用过这类合理想象，如介之推与母偕逃前的对话、钮麑不忍刺赵盾而自杀前的慨叹，都属于生无旁证，死无对证之事。《战》将这种合理想象，推广到细节描写上。如《秦策三·范雎至秦章》中范雎初见秦王，本是在宫中虚无人的绝密情况下进行的，而书中却详述此无他人知晓的现场中，秦王与范雎的种种情态，所写言谈举止上的细节，显然是作者的合理想象，近乎小说笔法。但由于作者能设身处地，依据历史人物的性格身分，作入情合理的设想，因此非但无虚假之感，反能对表现人物起到增饰渲染的作用，使秦昭王欲得密计的恳切与急切，范雎的谨慎老辣与圆滑，跃然纸上，维妙维肖。《战》中这种在忠实于史实的基础上，对细节作合情合理的想象的写作方法，是对艺术虚构手法的变用。这种合理想象方法的运用，对增强我国史传文学的艺术性有很大的帮助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也明显地借助了这种方法。

我国史籍历来有注重记言的传统。《左传》中有关春秋君臣谈话、外交辞令的记叙，都较出色。如烛之武退秦师时的沉着从容、楚使屈完驳齐桓公武力相胁时的义正辞严、子产据理为国力争时的委曲巧妙、晏婴劝导景公时的委婉深沉，都表现了较高的记言艺术。《战》继承、发展了《左传》等的记言成就。书中策士的说辞，纵横捭阖，逞词流丽，内容更深刻，辞锋更犀利，出色地反映了战国时期日臻成熟的论辩艺术。

《战》中最精彩的说辞，并非苏秦、张仪之流的纵横之谈。虽然他们的说辞中不乏佳句，如苏秦以“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如雨”，极言齐都临淄之盛，文工辞丽，为历代传颂，但他们的说辞大多流于套话，无非是言强，则弱者亦说成强大无敌；说弱，则强者亦说成是危在旦夕。只见政客鼓舌如簧的伎俩，缺少耐人寻味的深沉。书中最精彩的说辞，当数范雎说秦昭、蔡泽说范雎、鲁仲连说辛垣衍、苏秦说燕王以孝、信、廉等非进取之道等。这些佳文，为《史记》悉收，说明太史公亦为之折服。《赵策三·秦围赵之邯郸章》中，鲁仲连为了击退魏使辛垣衍带来的降秦黑风，向辛垣展开了说理攻势。先喻之以理，总结历史教训，说明尊秦为帝不能给各国诸侯带来苟安，只能使之沦入受人宰割的可悲境地。继而说之以义，以邹鲁小国尚能不屈从于强国为例，大讲帝秦可耻。在对方仍然执迷不悟的情况下，他又动之以利，讲帝秦将威胁各国大臣的利益，使辛垣衍之流也难保故宠，从而说得对方心惊肉跳，终于改倨为恭，主动请罪要求离去，并表示“不敢复言帝秦。”鲁仲连的这席话，不仅旁证博引，同时步步紧逼，很有气势。《秦策三·蔡泽见逐于赵章》中，蔡泽对范雎的说辞又别具特色。蔡泽是在被赵赶走，途中又遭抢劫，处境极为窘迫的情况下至秦的；他要游说的对象，是为相十年、深受宠幸的应侯范雎；游说的中心，是让范辞职而荐己自代。这几乎是天方夜谈式的神话，但蔡泽让它变成现实。由于他看清范雎当时已外强中干，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，已开始失宠，因此他一上来就毫不客气地指责范思想迟钝，劝他从四季更迭的自然规律中，体味“成功者去”的道理。聪明的范雎，何尝不懂这一常理，但由于名利心重与当局者迷，使他既不甘心蒙保身逃死的恶名，又对前程怀有几分侥幸，希望秦昭王能念旧德，希望自己时来运转。针对此，蔡泽先以忠而被杀的商鞅等，与见机而作、保身全己的微子等相比，说明只要志在济世，保身逃死不失为伟大，不必非杀身立忠以成名，从而消除其怕担恶名的顾虑。随后，他又作了两组对比：一比秦昭王在“慈仁任忠，不欺旧故”上，孰与秦孝、楚悼、勾践；二比范雎自己在功劳上孰与商君、吴起、文种。对比结果，使范雎清醒地

看到：面对在亲信旧臣上不如他人的秦昭王，功劳不如古人、享爵却高于古人的自己，如不知身退，则必遭杀身大祸。这就彻底粉碎了他心中尚存的侥幸。在此基础上，蔡泽又提醒他物盛则衰的规律，指出若辞相让贤，既可获廉洁之清名，又可享应侯之爵禄，长寿善终。这番有理有据的进言，使范雎心折，甘心情愿地荐蔡泽自代。

《战》在记言艺术上的成就，还表现在人物对话的个性化上。《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章》中甘罗的对话，就神情逼真地勾勒出这一少年的个性。当他自告奋勇欲为吕不韦解难，却遭呵叱时，他敏捷地以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为据，反驳吕对自己年少的不信任，又称："君其试臣，奚以遽言叱之？"流露出涉世未深少年的特有的委曲与不服气。他在前去说服张唐相燕时，连续发问，说得张唐急急上路，表现了少年甘罗的聪明机敏。然而，他每发一问，在对方作答后，又不放心地再次追问，非等对方再次证实："知之"后，才放心，这又表现了他的童稚之气。

综上可见，《战》在历史人物塑造上的成就，是卓著的。然而，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。它的主题思想过于狭隘，这不仅影响了全书的思想价值，也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。《战》是一部战国策士的颂歌，贯穿全书的中心主题，是"得士者昌，失士者亡"，全书的功利目的，是在推销士，向社会强调士的重要作用。出于这一目的，这部书不仅良莠不分地赞赏士中败类之狡计，同时也过分夸大了士中佼佼者的作用。鲁仲连义不帝秦故事中，将解除秦对邯郸之围的首功，记在鲁仲连身上，便是一例。《齐策四·齐人有冯谖者章》中，对冯谖作用的神化又是一例。据史学家统计，关于冯谖客孟尝君，《史记》与《战》的记载，不同之处达25处，除有些是由于所本的史料来源不同，从而导致事实的出入外，有些则是由于《战》作者为了神化士的作用，而对史实作了不真实的总结和改动。如冯谖的"焚券买义"，《史记》明确指出，孟尝君薛地放债，为的是弥补供养过于庞大的食客队伍而引起的财政赤字，因此，冯谖所焚的，只是那些收不上来的债券，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债务一笔勾销。《战》为了夸大冯的义举，将此事绝对化为冯谖的只收义，而不收利，而孟尝君对此居然也能隐忍。这显然是不合史实的。其次，《史记》肯定冯谖的作用，在于帮助孟尝君度过被逐至薛时的难堪，又助之复起，并未能确保田文的一生平安，以后孟尝君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波涛迭起。而《战》则全文以"孟尝君为相数十年，无纤介之祸者，冯谖之计也"作结。这显然又是夸大士的功绩，而难与史实相吻合。夸饰渲染用得恰当，可以添彩，但用过了头，反会使人怀疑它的真实性。对冯谖的神化，便是如此。《战》在这方面的欠缺，在以后《史记》的写作中，得到了很大的纠正。《史记》以其更广博深刻的思想主题，为我们展示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，塑造出更多，更丰富出色的历史人物形象，从而将我国的史传文学创作，推上了新的峰颠。但童稚是成熟的起步，人们赞美成熟，也珍视稚嫩的第一步。正因此，《战》所展示的神采各异的历史人物画卷，理所当然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。

---

① 《荀子·天论》。

② 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下》。

③ 长平之战后，范雎明知灭赵在即，但为了防止白起再建大功，而位居己上，不惜哄骗秦昭王缓攻赵都邯郸，从而给赵以喘息之机，推迟了秦灭赵的时间。

④ 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中，有关于苏秦资助张仪赴秦，而张仪以苏秦在世时不攻赵以相报的记载。这取材于拟托之作，不合史实。但说明司马迁并不认为张仪是单一的贪婪无行的小人。

⑤ 见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中的“太史公曰”。

⑥ 据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记载，苏秦活动年代在齐湣、燕昭时期，不可能早至秦惠王初立时。

⑦ 《秦策三·应侯失韩之汝南章》中，记范雎在丢失封地时，在秦昭王面前假作坦然，不在乎，秦昭王不信，通过秦臣蒙骜私下探听他的真实想法，当他发现范雎心口不一后，从此对范有所怀疑和提防。

⑧ 孔颖达：《尚书召诰正义》(《十三经注疏》上册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第 211 页)。

⑨ 洪迈：《容斋随笔》卷九。

⑩ 缪文远：《战国策考辨》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。

参考文献

① 缪文远：《战国策考辨》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。

② 何建章：《战国策注释》，中华书局 1992 年版。

(责任编辑　马鸿盛)

(上接第 37 页)

⑨Neil Smith，1980，Deurdre Wilson，MONDERN LINGUISTICS—— THE RESULTS OF RESULTS OF CHOMSKY'S REVOLUTION，Indiana University Press.

⑩ Hanvey，R.T.，1979，CROSS-CULTURAL AWARENESS in TOWARD INTERNATIONALISM，READINGS IN CROSS-CULTURAL COMMUNICATION，ed. by Elise C. Smish & Louise Fiber Luce，Newbury House Publishers. Inc.

⑪Wolfson，N.，1983，“Rules of Speaking”，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，Longman.

⑫胡文仲：《跨文化交际学选读》(英文版)，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。

(责任编辑　隋　岩)